

DOI: 10.13288/j.11-2166/r.2019.05.021

论诸子兵法思想与中医治疗时机

胡蓉, 严世芸*

(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人文研究院, 上海市浦东新区蔡伦路 1200 号, 201203)

摘要 先秦诸子思想是中医理论构建的重要源泉, 源自诸子的兵家思想在中医文献中有了进一步的诠释, 兵家重视稍纵即逝的战机, 在中医治疗上时机也同样重要, 表现在顺应时机知进退、把握时机有向导、时机易逝忌犹豫、良医独知不妄药等方面。

关键词 诸子; 兵法; 治疗时机

先秦诸子思想是中医理论构建的重要源泉, 其中兵家思想与中医理论更有诸多联系, 正所谓“用药如用兵”。我国最早的兵法专书《孙子》, 著成于春秋时期, 流传千载, 稍后的《吴子》兵法也历来为人所重。除此之外, 在《老子》《吕氏春秋》《淮南子》等书中, 也有不少关于用兵之道的名言, 无不与医学有关, 对医家思想和用药方法有重要的影响。兵家重视稍纵即逝的战机, 在中医治疗上时机也同样重要, 源自诸子的兵家思想在中医文献中有了进一步的诠释。

1 顺应时机知进退

兵家有“治气”的策略, 孙子云“善用兵者避其锐气, 击其惰归, 此治气者也”; “无要正正之旗, 勿击堂堂之陈, 此治变者也”^[148], 指出治气有常有变、有进有退, 进退之间最重要的就是顺应时机。《淮南子·兵略训》曰“善用兵者, 当击其乱, 不攻其治, 是不袭堂堂之寇, 不击填填之旗。”^[1069]对于初遇的强敌应该要避其锐气, 静以待变, 直待到敌方出现懈惰、归散的情势时, 就乘而率众进击, 可获大胜。治症正符合兵法此意, 如《素问·疟论篇》曰“其症者之寒, 汤火不能温也, 及其热, 冰火不能寒也”, “当此之时, 良工不能止, 必须其自衰乃刺之”^[7]。《灵枢·逆顺》更是直接引用兵法之言以比喻针刺之法, 如“兵法曰: 无迎逢逢之气, 无击堂堂之阵。《刺法》

曰: 无刺焯焯之热, 无刺漉漉之汗, 无刺浑浑之脉, 无刺病之与脉相逆者”^[96], 从医学的实践指出正确的方法应该是顺势而为, 不可以逆攻顺。

关于顺逆的问题, 古代医家很是重视。《韩非子·初见秦》曰“臣闻之曰: 以乱攻治者亡, 以邪攻正者亡, 以逆攻顺者亡。”^[9]据《史记》记载, 韩非子在秦始皇十四年使秦, 对秦始皇说到“世有三亡”, 即上文所说, 三亡之说本治国用兵之道, 但所谓“治身与治国一理也”。《灵枢·师传》曰“未有逆而能治之也, 夫惟顺而矣。顺者非独阴阳脉论气之逆顺也, 百姓民众皆欲顺其志也, ……入国问俗, 入家问讳, 上堂问礼, 临病人问所便”^[63], 强调了“顺”的重要性。

《吴子·料敌》曰“见可而进, 知难而退”^[14], 医者用药亦当如此, 不可执持, 而是要顺应时机。明代张景岳以用兵之道著《八阵》, 其论用药有《新方八阵》, 包括补略、和略、攻略、散略、寒略、热略、固略、因略等八者, 方略的运用灵活变化, 正是顺势而为的最好体现。张景岳曰“知宜知避”, 而“八方之制皆可得而贯通矣”, 即吴子所言, 实为明智之举。

把握时机、顺进逆退是兵家医者的共同理念, 而时机则需要耐心的等待, 所谓以静制动的一种谋略, 《孙子·九地》曰“谨养而无劳, 并气积力, 运兵计谋, 为不可测”^[247], 使力量逐渐壮大, 最终克敌制胜。医家对于久病体弱气虚难复的患者, 其治疗方略与兵法不谋而合。《素问·五常政大论篇》曰“其久病者, 有气从不康, 病去而瘠, 奈何? ……养之和之, 静以待时。谨守其气, 无使倾移, 其形乃彰, 生气以长”^[153], 指出了谨养无劳,

基金项目: 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科研项目(20184Y0246); 上海中医药大学预算内项目(18WK102); 上海中医药大学第三批“中青年骨干教师教学能力提升资助计划”

* 通讯作者: yansy514@126.com

使血气恢复,形体康复的重要治疗意义。又如,李杲治疗脾胃内伤的患者,在用补中益气药的同时,只允许患者“小役形体”,而勿使过劳,如《兰室秘藏·劳倦所伤论》曰“有所劳伤,皆损其气,……当病之时,宜安心静坐,以养其气”^[1],这些经验都与《孙子》之法完全吻合。

2 把握时机有向导

兵家用兵强调得天时地利人和。《淮南子·兵略训》曰“上将之用兵也,上得天道,下得地利,中得人心,乃行之以机,发之以势,是以无破军败兵。”^[1081]《黄帝内经》论医学,则强调知天文、地理、人事。这二者都是《易》“有天道焉,有人道焉,有地道焉”的三才思想在军事和医学方面的体现。“知己知彼,百战不殆”是《孙子·地形》中的名言,《吴子·料敌》亦曰“吾欲观敌之外,以知其内;察其进,以知其止,以定胜负”^[14],指出充分了解敌方情况可以奠定双方战争的胜负。《吕氏春秋》采其说,曰“悉熟遍备,知彼知己”^[9]。医者用药如用兵,故历来医家多以此言为训,如唐代杨上善在《黄帝内经太素》中强调,养生者应当在多方面注意“内养形”和“外养形”,以为“内外之养周备,则不求生而久生,无期寿而寿长也”^[9]。重要的就是“周备”,养生之内外周备,亦同于用兵的“悉熟遍备”。

《孙子·九地》曰“不用乡导,不能得地利”,“乡导”即向导,进军必用向导,以得地利。徐大椿称“向导之师”,《医学源流论·用药如用兵论》曰“辨经络而无泛用之药,此之谓向导之师”^[11],因此,医家用药,也贵“向导”,旨在引导之意。金代李杲《珍珠囊补遗药性赋·用药法》云“病有宜寒剂者,以热剂为向导之兵;病有宜热剂者,以寒剂为类从之引”^[11],明确地表达了向导之剂的作用。早在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篇》中就提出“善用针者,从阴引阳,从阳引阴”。《类经》曰“病在阳而治其阴也”^[123],张志聪注:“从阴而引阳分邪”,意指病在阳经,当先刺阴经以引导之。受此启发,后世医家多有发挥。明代赵献可《医贯·论血症》曰“真阳虚者,从阴引阳;真阴虚者,则从阳引阴。”^[13]明代张景岳进一步提出“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,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;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,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”^[123],并创制左归丸和右归丸以调和阴阳。以上都说明向导之师发挥引导作用的重要性。

同时李杲之师张洁古创药物“归经”和“引

经报使”之法,提出药物专入其经络脏腑之说,如“头痛须用川芎,如不愈,各加引经药,太阳蔓荆,阳明白芷,少阳柴胡,太阴苍术,少阴细辛,厥阴吴茱萸”。《医学启源·主治心法》云:“胁下痛,往来寒热,用柴胡。胃脘痛,用草豆蔻。气刺痛,用枳壳,看何经,分以引经药导之”^[14],认为引经药作用在于向导,随宜而用。手足十二经均有引经药,如太阳小肠、膀胱病,在上用羌活,在下用黄柏;阳明胃、大肠经病,在上用升麻、白芷,在下用石膏等。制方应注意“引经报使”,若药用向导,其力专入,治疗则事半功倍。

3 时机易逝忌犹豫

《吴子·治兵》认为,“用兵之害,犹豫最大。三军之灾,生于狐疑”^[25],即狐疑犹豫为兵家之大害。后《淮南子·兵略训》亦曰“下将之用兵也,博闻而自乱,多知而自疑,居则恐惧,发则犹豫,是以动为人禽矣”^[1081],提示战机当前,犹豫不决,必反受其害。犹豫、狐疑也是医者所大忌,尤其是当病危急救之时,更须确诊病情,当机立断,绝不能犹豫不决。唐代孙思邈《备急千金要方·大医精诚》告诫曰“病宜速救,要须临事不惑,唯当审谛覃思”^[131],提示在临床上尤其是亡阳厥脱之证,危在瞬息,回阳救急,不可犹豫。张介宾论附子时援引吴绶《伤寒蕴要》曰“附子,乃阴证要药,凡伤寒传遍三阴及中寒夹阴,虽身大热而脉沉者必用之,或厥冷腹痛,脉沉细,甚则唇青囊缩者,急须用之,有退阴回阳之力,起死回生之功。近世阴证伤寒,往往疑似,不敢用附子,直待阴极阳竭,而用之已迟矣”^[12643]。附子辛甘温大热,为通行诸经引用药,入手少阳经三焦、命门,多用于急症、重症。应用时当机立断,多有良效,一旦病机已过,将军要药也莫奈何。张介宾《景岳全书·新方八阵》曰“至于附子之辨,凡今之用者,必待势不可为,不得已然后用之,不知回阳之功当用于阳气将去之际,便当渐用,以望挽回。若用于既去之后,死灰不可复然矣,尚何益于事哉”^[121247],明确指出时机不可延误,否则于事无补。

临床治疗用药行针忌犹豫而神思不专注,就像郭玉回答帝王所言“医之为言意也。腠理至微,随气用巧,针石之间,毫芒即乖。神存于心手之际,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”^[14]。医学是一种经过医者精心思辨的过程,而不是一种无需用脑的熟练技能^[17],医术疗效往往就在神思犹疑的毫厘之间。唐代孙思邈《备急千金要方·大医精诚》训诫曰:

“省病诊疾，至意深心，详察形候，纤毫勿失，处方针药，无得参差”^[1]，只有平时不断地磨炼积累临证经验，才可能做到遇战机而不犹疑，这是一种职业自信的表现。“故学人必须博极医源，精勤不倦，不得道听途说，而言医道已了，深自误哉”^[1]。

4 良医独知不妄药

战机把握要依靠临阵为将者的裁决，正如“夫将者，必独见独知。独见者，见人所不见也；独知者，知人所不知也。见人所不见，谓之明；知人所不知，谓之神。神明者，先胜者也”^[1096]。《庄子·天地》早有“视乎冥冥，听乎无声”独见独闻之论。《淮南子·兵略训》亦有为将者“独知独见”，神明先胜的类似论述。无独有偶，医经上也有这样的要求，如《素问·八正神明论篇》曰：“观其冥冥者，言形气荣卫之不形于外，而工独知之。以日之寒温，月之虚盛，四时气之浮沉，参伍相合而调之，工常先见之。然而不形于外，故曰观于冥冥焉”^[54]。因人之血气变化不可见，故称“观于冥冥”，医者应能对荣卫营气的变化神而明之，“神乎神，耳不闻，目明，心开而志先，慧然独悟，口弗能言，俱视独见，适若昏，昭然独明，若风吹云，故曰神”^[55]，有独知独见，方可临证决断。

医者临阵的杀伐决断固然重要，但上工治未病，故良医需时刻牢记“不尽知用兵之害者，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”，高明的医生深知药害，主张不妄服药。《备急千金要方·食治》云“夫为医者，当须先洞晓病源，知其所犯，以食治之。食疗不愈，然后命药。药性刚烈，犹若御兵。兵之猛暴，岂容妄发，发用乖宜，损伤处众。药之投疾，殃滥亦然。”^[395]金代医家张子和明确提出“药邪”致病，则是对此观点的进一步发挥。清代名医徐大椿对药害的论述也颇为切当，如《医学源流论·用药如用兵论》曰“圣人之所以全民生也，五谷为养，五果为助，五畜为益，五菜为充，而毒药则以之攻邪，故虽甘草、人参，误用致害，皆毒药之类也。古人好服食者，必生奇疾，犹之好战胜者，必有奇殃。是故兵之设也以除暴，不得已而后兴；药之设也以攻疾，亦不得已而后用，其道同也”^[38]。凡药皆有偏性，医家以药之偏性来纠正人体气血阴阳之偏颇，中病即止，不可久服，否则变生他病，所以良医主张不妄用药。

5 结语

经子学术思想与中医学术思想原本产生于同一

时空。在古书中传统文化思想对于医学的启示和融合，其证据随处可见，反之医学对于文化思想的影响也不容忽视。甚至古今曾将医家治身与政治家的治国相提并论，如《吕氏春秋》曰“夫治身与治国，一理之术也”，可一言以蔽之。可以说，二者交相呼应，显示出古人的共同智慧。先秦、汉代经子著作的医学研究，即是对经子著作中有关医学方面的论述进行解读，以及从医学的角度去审视和理解经子著作中的其他有关论述，乃是传承传统文化和研究中医学术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。正本清源，方可溯源逐流，中医药的肇兴是多源的，从目前流传的医学文献来看，秦汉诸子思想为医学的整合与流变提供了充足的养分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孙武. 十一家注孙子校理 [M]. 杨丙安, 校理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93.
- [2] 何宁撰. 淮南子集释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98.
- [3] 佚名. 黄帝内经素问 [M]. 田代华, 整理. 北京: 人民卫生出版社, 2005.
- [4] 佚名. 灵枢经 [M]. 史崧, 重编. 南宁: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16.
- [5] 王先慎. 韩非子集解 [M]. 钟哲, 点校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98: 2.
- [6] 吴起. 吴子兵法注释 [M]. 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1977.
- [7] 李杲. 兰室秘藏 [M]. 刘更生, 臧守虎, 点校. 天津: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, 2000: 2.
- [8] 许维通. 吕氏春秋集释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9: 421.
- [9] 杨上善. 黄帝内经太素 [M]. 北京: 人民卫生出版社, 1965: 328.
- [10] 徐灵胎. 医学源流论 [M]. 刘洋, 校注. 北京: 中国中医药出版, 2008: 38.
- [11] 李东垣, 李士材. 珍珠囊补遗药性赋 [M]. 上海: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, 1958: 8.
- [12] 张介宾. 景岳全书 [M]. 北京: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 1994.
- [13] 赵献可. 医贯 [M]. 陈永萍, 校注. 北京: 学苑出版社, 1996: 60.
- [14] 张元素. 医学启源 [M]. 任应秋, 点校. 北京: 人民卫生出版社, 1978: 55.
- [15] 孙思邈. 备急千金要方 [M]. 鲁兆麟, 主校. 沈阳: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, 1997.
- [16] 范晔, 李贤. 后汉书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99: 1847.
- [17] 张枢明. “医者, 意也”辨析与正名之溯源求真 [J]. 中医药文化, 2017, 12(1): 18-24.

(收稿日期: 2018-08-06; 修回日期: 2018-09-25)

编辑: 黄 健